生活故事

拜年

■方鸿儒 文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,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岁岁拜年,年年不同。

小时候,父亲带我去拜年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,因为家道中落,我家从兆丰新邨迁到浦东塘桥。小小年纪,穿戴整齐,大年初二父亲便带我去蓬莱路大姨父徐家阿爸家拜年,打躬作揖叫声“徐家阿爸好!”

姨父家公私合营后,家境仍殷实,三层小洋楼,落地无线电。午餐酒席满桌佳肴,印象最深的便是暖锅和鱼翅。记忆中,有一年拜年回家,父亲还带我乘小舢板过黄浦江,船随浪颠,很是惊险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凭票供应岁月,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历次运动,亲朋好友间的走动,也颇为避嫌。但年总是要拜的,亲情也是断不了的,于是我便代父亲去拜年了。

大年初一,我先到天潼路大孃孃家拜年。大孃孃总是先煮酒酿圆子水铺蛋给我吃。吃完后,便和文鸿表哥一起到兆丰新村给大伯母、菊仙阿姐拜年,然后再到曹杨新村给小孃孃拜年。

年年如此,直到我上山下乡。

上山下乡,游子在外,“有钱无钱,回家过年”是知青一代的一年期盼,真是归心似箭。

回到上海,便互相串门拜年。记得1974年春节,我们六连好友长脚、林祺、政明、志勇、丽玲和我,一起回沪探亲过年。于是从我家开始,一天一家聚餐。虽是票证时代,但家家都想方设法拿出最好的食材酒菜来招待。一圈吃下来,彼此拜过年,假期也快结束了,该返回连队了。

1989年夏,父母从塘桥老屋动迁到了潍坊新村。于是我们相约每年大年初一去父母家团聚拜年。

我们兄妹七人,三口之家,三七二十一,一桌圆台面是坐不下的,还要再搭一张桌子。一家三代,团团围坐,享受着满桌的美味盛馔,也享受着天伦之乐,气氛好极了。

下午的点心,是母亲包的宁波汤团。吃完晚饭后,父母还要给第三代压岁钱。然后我们才嘻嘻哈哈,满载而归地和父母道别。而此刻,街上已是华灯璀璨,爆竹声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节过年是最开心,最闹猛的——父母健在,兄妹健康,孩子活泼。

渐渐地,母亲烧不动了,于是我们决定轮流作东,把父母接到酒家过年。2000年春节从我长子开始,在羊城酒家兄妹齐聚,热热闹闹陪父母吃团圆饭。

然而2006年春节,论到五妹作东时,母亲已病入膏肓,形销骨立了,我们搀扶着母亲去了扬州饭店。

进饭店后,我们一家家和父母合影,并录了像。那年,是我们最后一次陪母亲一起吃春节团圆饭。

母亲过世后,父亲独居在家。每年除夕,我们都去潍坊老屋给父亲拜年。先给母亲做忌日,摆上供品,点上香烛,拜了再拜。然后陪父亲吃吃年夜饭。但已少了母亲在世时的欢乐与闹猛,多了心头挥之不去的感伤和缅怀之情。

2013年春天,父亲也过世了。那年冬至,在给父亲落葬后回家的路上,四妹说:“阿哥,明年春节阿拉到侬屋里厢拜年,好伐?”我说:“好啊!”

于是,经与妻商量,便有了2015年春节大年初四首次“家族聚会”。席间,我对弟妹们许诺:以后每年大年初四便是我们家族“团拜日”,由我大哥买单。

此后至今也已十个年头了,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生命的年轮一圈圈,周而复始。人,就在“拜年”中长大,成熟和老去。

日出时分体育场 ■陈祖金

岁月悠悠

“学刺绣”之忆

■庄美玲 文

学刺绣60多年,虽未成为谋生“饭碗”,却也得到不少益处,“艺不压身,技多得益”不是虚幻之言。

12岁那年,我在妈妈朋友吴阿姨家看到一幅挂在墙上的“画”:一轮圆日高悬空中,红艳艳,亮闪闪,光透氤氲雾气,漫射崇山峻岭,壁立悬崖,葱郁林木,盛放百花,曲弯溪流,飞溅浪花,处处抹上了淡淡的胭脂;淡红翠绿相间,明暗阴晴相映,空灵幽深交汇,飘渺如仙境,似有松涛呼啸,鸟鸣猿啼。

画面大气磅礴,延展无边;色彩亮丽,浓淡融和,看得我心潮起伏,崇拜油然而生。忙问吴阿姨这是谁“画”的,吴阿姨灿然一笑:“这是我绣的。”

顿时对“刺绣”有了神奇之感。“吴阿姨,你教我刺绣吧。我很喜欢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好啊。”说着,吴阿姨拿出一个约巴掌大的圆形绣花绷子,夹上一块白布,穿针引线,双手联动,针飞线穿,一条色彩红黄相融,体形丰腴,眼球突出,尾巴飘逸的小小金鱼就出现在白布上。

这神奇的绣功看得我目瞪口呆,佩服不已,想学的愿望更加强烈。“吴阿姨,教教我,我一定好好学。”我近乎哀求了。吴阿姨和妈妈相视一笑,连连说:“好,好。我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。”

多年后才知道,这是妈妈和吴阿姨的“阴谋”。刺绣是吴阿姨家传技艺,从小受到耳濡目染的她对刺绣的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。只是在分配工作时,吴阿姨进了国棉九厂当了会计,后来生了个儿子,儿子又生了个儿子,“自古多绣女,未见男儿身”,自家相传无望,就看中了我。和妈妈合计一番后,演了这一出“请君入瓮”。

俗话说,门外看热闹,门里学门道,门道千万条,条条心血耗。刺绣,看似轻松自在,实则繁,杂,累,一幅绣品,须经几十道工序,绷布、描图、选针、分线、配色、穿刺、整理等;不仅要手巧心细,更须静得下心,沉得住气,凝得住神,坐得住凳子,经得起“同龄窗外嬉闹,我却对绷独坐”的诱惑和冷落。

小件如手帕、绣花鞋、童帽等,可用大大小小的“圆绷子”,右手捏针,上穿下刺,左手握绷,左右上下配合翻转,一气呵成。用它时比较“自由”,可站可坐,冬天追太阳,夏日避暑热,只要有光线,眼睛能看清就行。

大件呢,如衣服、枕套、帐沿、寿幛、挂件等,需用约两厘米粗的木棍做成的长方形的绷架,绣工坐于一侧,右手在上,把针刺下,左手在下接住,再“盲扎”上来。这要求很高,不仅每一针要紧靠原扎下去的地方回上来,而且每针必须距离一致,否则绣出来的画面会粗糙不平;左右手用力更须相同,否则松紧不一,绣出的画面会起皱褶。绣时虽然身可坐,腰可直,但颈弯头低,不一会儿就会脖酸头胀眼花腿麻;精力须高度集中,一针刺错,轻则返工,重则成次品、废品。没有三五年的基本功,是不敢轻易坐绷架的。一般人家,都是把绷架安放在窗下光线最好的地方,绣工离开,必遮盖上,其他人是不允许碰的。

初学者总是按照布上的花样刺绣,虽可形似,但没神韵;高手则心中有谱,眼里有物,手上有数,善用五光十色的丝线,巧妙配色,把眼中所观万事万物,脑中所想千姿百态,用针和线勾织出来,形神兼备。我师傅就如此。她的一幅幅绣品,是立体的画,光彩夺目,鲜活灵动,色彩和谐,充满活力,物有灵,人有神,牡丹艳、芍药娇、梅花傲,水仙清高凌波而至,荷花并蒂含苞待放;鸟雀似鸣,虎豹正啸,猫慵懒,狗机灵,鸳鸯交颈似呢喃,喜鹊登梅正报喜。人见人夸,索要者不断,师傅应接不暇。那时不兴“第二职业”,都是无偿赠送,否则,师傅肯定会发财的。

那时我家住“两万户”的控江二村,到师傅家去三站多路,每到约定时间,我总是风雨无阻,去时蹦蹦跳跳,奔着希望;回时哼哼唱唱,收获丰厚。虽然师傅挺严厉,我常被呵斥,而且近3个小时的操练,手指酸疼,眼睛酸胀,手臂酸麻,但我没有退缩之意,一直坚持学了下去,掌握了刺绣的基本技艺,并向“高、精、尖”迈进。我的小件,师傅还赠送给人呢。对当时的认真学,我现在的感觉是:愿做乐做尽心做,世无难事,必取真经;逼做罚做敷衍做,眼尽蜀道,岂修正果。

1969年,我下乡插队到了南通长江边的一个公社。当地有项中青年妇女几乎人人参与的副业——为外贸企业绣花。我掌握的绣花技艺,正好有了用武之地。大约是受教育、文化、见识、眼界、欣赏水平的限制,加上赶速度、多赚钱的驱动吧,当地的妇女大都只“依样画葫芦”,绣不出人、物的精、气、神,风、姿、韵。而师傅的“要用心绣”的教诲,让我一直努力做到“精益求精”,不仅用手,一针一线,一丝不苟;更用脑,注重色彩的搭配,针脚的疏密,手法的运用。一幅幅绣品,虽大逊色于师傅,但也能绣出山青似在泛光,水秀似在流淌,树挺似在伸腰,草绿似在拔节,花苞欲开又羞,花瓣尽情舒展,黄鹂在翠柳间啁啾,白鹭在青天里振翅。

凭着这手技艺,很快在众多的绣工中崭露头角。我成了绣“样品”的专业户;凡有评比活动,都让我“出头露面”,在刺绣圈内颇有名气。只是那时候只有精神奖励,但对一个知青来说,我已很满足了。

因为“刺绣”,助我避开了许多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繁重农活。我的许多插友,终年在田间劳作,工分还抵不了粮草钱,而我基本能自己养活自己。这在知青中,为数不多。每想到此,我特别感谢妈妈和师傅当初的“阴谋”,也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庆幸,对当地颇为流行的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的俗语,有了新的理解:厄运总降慵懒者,弃渔取鱼乐眼下;机遇垂青有备人,轻财重才挂云帆。

1977年,我被招工进了当地的农机厂,教我车床的师傅竟然比我小好几岁,正准备结婚。我无以为表,就起早带晚,赶绣了一对鸳鸯戏水、交颈呢喃的枕套、一条喜鹊登梅的帐沿(当时乡镇离不开蚊帐,帐沿挂在帐子前)送给我的第二位师傅,获得一片赞扬声。当即“生意兴隆”,当场就收到了5个订单,3单是“师兄师姐”的,2单是“师爷师奶”为自己的子女的。虽然只是口头协议,并无书面合同,更谈不上定金,且明知是“财源不进倒贴钱”的买卖,但我宁可少看电影少逛街,也认真履约。这些“合同”也成了我人缘关系的润滑剂。进厂不久,我就被“提拔”为仓库保管员,又一次远离了油污、铁屑。

没过几年,“机绣”替代了“手工绣”,人们的欣赏情趣也发生了转移,绣花衣、绣花鞋、绣花帽除了在舞台上还保留有一席之地,生活中连小孩子也无人穿戴,甚至以往结婚必备的绣花被、枕套等也少人问津。我,过上了“无人上门讨绣品”的清闲生活。

闲暇时,还常回忆起学刺绣的情景,想起妈妈、师傅当年的良苦用心,想起凭刺绣技艺立足社会的情景。眼下,刺绣,虽一时步入低谷,但一定不会消失,她会永远流传,因为她是中华文明的瑰宝。

意犹未尽

老人家

■童伟忠 文

初冬的早上,我陪老伴去医院配药。

在小区门口乘上一辆网约车,行不多远,坐在后座的老伴意外发现,在我和她的座位之间,有一只手机静静地躺在那儿,猜测可能是前一单乘客粗心遗忘的。

丢失手机后的失魂落魄,我有切身体会。想起丢失手机者的烦恼、焦虑,我和老伴赶紧告知司机,并将手机交给他,请他设法尽快归还丢机乘客。

司机是位皮肤黝黑的外地小伙子,他接过手机说,有七成新,还是苹果呢!他将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位上,答应做完这单,马上与前单乘客联系。

车到目的地,我搀老伴下车,司机小伙也跟着下车,特地走到我们面前,鞠了一个躬,说他代乘客谢谢两位老人家。

“老人家”!前不久,我和老伴确实申领了敬老卡。

对“老”刻骨铭心,还是我退休前三个月的一次经历。

也是冬天的一个早上,我在上海西站挤上地铁11号线,应约去浦东的一家下属单位讲课。11号线号称轨道交通线路最长的地铁,上班高峰时段车厢拥挤,我拉好车门旁的扶手,闭上眼睛,心里打着讲课的腹稿。“爷爷,您请坐!”耳畔传来一位女孩的招呼声,我依然沉浸在闭目构思中。

感觉衣角被人扯动了一下,睁眼看见靠近扶栏的座位上,一个十多岁、扎着羊角小辫的女孩示意为我让座,我下意识地摇头婉拒,暗忖:还未退休,怎就成了“老爷爷”了呢?

但女孩已立起身,坚持请我坐下,望着天真无邪的眼神,我心有惴惴地享受了一回“老爷爷”的待遇。

在公共场合第一次被陌生人尊为“老爷爷”,颇感不适。

回家与妻子说起此事,本想博得“同情”,孰料,她竟完全站在女孩一边,说:“你是到了这岁数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”

我欲反驳,妻已开始“举证”:“侬虽然额骨头上看不出电车纹路,可头发稀稀拉拉,头顶上已经全军覆没。”这倒是事实。我刚进单位时,头发如茂盛森林,半个月不理,便显得邋遢不堪,厂工会有理发手艺的小王,每月15日、30日的午休时间全部贡献给了我,至今仍心存感激。

而近花甲,两个月都不用理一次发,偶尔去小区附近的“烦恼丝”理发,胖胖的男理发师总会说:“你好久不来了。”

是啊,我这个“几根发”客户还需要常来理发店吗?

“还有,以前电梯故障,侬勿当回事,12楼走楼梯,上上下下几趟,一点勿吃力,现在呢……”妻还在揭短。“好了好了”,我已毫无招架之力。

外有尊称,内有“佐证”,焉能“不服老”!如今,逢公交、地铁上有人给我让座,我已没有了违和感,致谢后入座,内心坦然。

可对穿越时空、超前而至的“老人家”称呼,还难以欣然接受。我的理解是,这种专属高龄长者的尊称,其内涵远比年龄要丰富,比如:德高望重、胸襟开阔、处事豁达、仁慈和蔼等等。对此,我非常崇敬,心向往之。期盼着在慢慢走向这个尊称的路上,力争做一个不讨人嫌、不让人忧、不添人烦的睿智“老人家”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